

陈思和 周 斌 主编

名师名流

M I N G S H I M I N G L I U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北科图书 P0101486

名师名流 (上)

M I N G S H I M I N G L I U

陈思和 周 斌 主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名师名流/陈思和、周斌主编.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9

ISBN 7 - 5633 - 5693 - 2

I. 名... II. ①陈... ②周... III. 复旦大学—教授—生平事迹—现代 IV. K82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7834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 <http://www.bbtpress.cn>)

出版人: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泰安市灵山大街东首 邮编:271000)

开本:890mm × 1 240mm 1/32

印张:26.375 字数:700 千字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60.00 元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丛书总序

复旦大学中文系自 1925 年建系,悠然八十,人才辈出,自有深厚的学术积累。一批在国内外学术领域享有盛誉的学者,教书育人,薪火相传,创建了许多有特色、有影响的学科,形成了有特色的学术流派。同时,复旦大学的校园文化也有悠久历史,复旦诗社、剧社等文学团体为新文学运动做出过自己的贡献。现经中文系学术委员会讨论,决定编辑一套研究丛书,在学理层面上总结探讨复旦中文系著名学者的治学经验和特色学科、文学社团的历史传统,以求弘扬复旦中文系的学术传统,继往开来,进一步加强中国语言文学各个学科的建设,并以此纪念复旦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和中文系建系八十周年。

本丛书分为甲、乙两种:

甲种本《名师名流》为著名学者的研究专辑。复旦大学中文系建系以来,拥有许多杏坛名师、学术名流,他们张学术独立、思想自由之大旗,追求无所羁绊的学术境界,他们中间有《共产党宣言》中文本的翻译者陈望道先生,有诗文并茂才华横溢的刘大白先生,有自称不京不海不江湖的陈子展先生,有清华国学院的传人蒋天枢先生,有学者、编辑、翻译家兼于一身的赵景深先生,有活跃在戏剧舞台上的洪深先生,有著名新文学作家和翻译家夏丏尊,靳以,方令孺,谢六逸等先生,是他们开创了思路开阔、学风活泼、新旧相济、研究创作并重的中文系学术格局。1950 年代全国院系调整,中文系受惠多多,与整个复旦大学一样,聚集一大批学有专攻的著名学者,风云际会,开创了复旦中文系历史上最好

的学术局面。这其中陈望道教授之于中国语法修辞研究、郭绍虞教授之于古代语言文学和批评史的研究、朱东润教授之于古代文学和传记文学的研究、陈子展教授之于先秦文学和近代文学史的研究、王欣夫教授之于文献书目学研究、吴文祺教授之于古代汉语研究、赵景深教授之于戏剧和通俗文艺研究、张世禄教授之于古代汉语史研究、蒋天枢教授之于清代学术研究和《楚辞》研究、刘大杰教授之于中国文学史研究等,形成了中文系“十老”的语言文学治学传统,皆足代表当时的学术水平。半个世纪风雨路,江山代有才人出,1980年代以来,中文系在“十老”治学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文学史研究、文学批评史研究、中国语法修辞研究等特色传统,建立起几代专家学者组合而成的学术梯队;同时,贾植芳教授为中文系现当代文学和比较文学两个学科的建设奠定基础,胡裕树教授在现代汉语语法研究领域、蒋孔阳教授在西方美学研究领域都有独特而重要的贡献。因此,对这些前辈学者的学术贡献和治学方法进行研究总结,显然是十分必要的。

乙种本为对复旦大学文学社团和复旦中文系有特色、有影响的学科传统的系列研究,其中包括“复旦剧社与中国现代话剧运动”、“复旦中国文学批评理论体系研究”、“复旦中国文学史传统研究”、“陈望道对复旦语法修辞学科的贡献”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复旦剧社是全国话剧领域颇有盛名的话剧社团,它在洪深、朱端钧等前辈戏剧家的领导下,对中国现代话剧运动曾做出过较大的贡献,也产生过较大的影响。中国文学批评史和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历来是复旦大学中文系学术研究的强项,不仅编著出版多部有影响的文学史、批评史的著作,而且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学科传统,形成了较为强势的学术梯队,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影响。陈望道先生所著《修辞学发凡》是中国修辞学的奠基之作。在此基础上复旦的修辞学研究也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学科。

上述专题研究的论文作者,基本上是中文系的硕士生和博士生,通过公开招标的形式授予项目,每位作者都配备了专门的指导老师,给予具体指导。这些论文的作者都能做到认真查阅、收集资料,对所承担的课题做深入研究,在学理层面上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总结。尽管这些见解未必都很准确,学术水平也高低不齐,但其分析评述有理有据,

有些论文还提出了有一定理论深度的学术见解,这是难能可贵的。对于他们来说,写作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前辈学者的人格精神和治学经验,无疑是一笔宝贵财富,值得认真学习和继承借鉴。

从中文系学术委员会确定选题到招标确定作者,从完成论文写作到编辑丛书出版,时间有两年左右,但由于经验不足,整个工作仍然处于比较紧迫的状态下面运行。其中有几个选题因为完成得不够理想而不得不暂时空缺。陈望道教授是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理论的传播者之一,长期担任复旦大学校长,并且对中国语法修辞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本丛书乙种本专门收入《陈望道对中国语法修辞研究的贡献》一书,有详尽论述,为了避免过多重复,故而在甲种本的简易传论里未予收录,特此说明。整个工作中,由于时间迫切,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欢迎专家学者和读者诸君批评指正。该丛书的出版得到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领导的大力支持,尤其是郑纳新先生花了大量的心血,为的是及时赶在复旦校庆前出版。在此也表示衷心感谢。

陈思和 周斌

2005年8月

目录

CONTENTS

丛书总序	陈思和 周斌 1
象牙塔内 故纸堆中	
——郭绍虞教授传论	1
现代传记文学的拓荒者	
——朱东润教授传论	113
诗骚直解堪千古	
——陈子展教授传论	159
海内耆英第一流	
——吴文祺教授传论	181
辨章学术 考镜源流	
——王欣夫教授传论	253
中国戏曲研究的拓荒者	
——赵景深教授传论	287
学贯中西	
——张世禄教授传论	321
读书不肯为人忙	
——蒋天枢教授传论	371
从进化论到唯物论	
——刘大杰教授传论	435
乘风破浪万里浪	
——刘大白教授传论	473

开拓者的贡献

- 洪深教授传论 515

隐微的新月

- 方令孺教授传论 581

从个人到众人

- 章靳以教授传论 633

把“人”字写端正

- 贾植芳教授传论 689

语法学思想研究

- 胡裕树教授传论 7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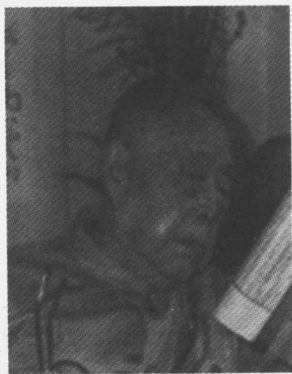
美在创造中

- 蒋孔阳教授传论 795

象牙塔内 故纸堆中

——郭绍虞教授传论

■ 刘竞飞



郭绍虞先生生平/郭绍虞的中国文学史研究/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郭绍虞的语法修辞研究/郭绍虞的文学整体论思想和他留给我们的启示

郭绍虞先生(1893—1984),复旦大学中文系一级教授,为我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史研究专家,同时又是著名的教育家和书法家。

郭绍虞一生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语言学、训诂学、书法理论等多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取得了多方面的学术成就。尤其是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在中国学术界形成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他在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时所确立的学术思路以及所表现出的学术智慧可以说是启迪了后来的整整几代学人。

郭绍虞在文学批评史研究方面所取得的特出成就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他在其他学术领域所取得的成绩。一段时间以来,学者们对郭绍虞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多有论述和肯定,但通常却很少谈及郭绍虞在文学史和语言学等方面做出的学术贡献——事实上,文学史研究、批评史研究、语法修辞研究是郭绍虞整个学术体系中三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三者不仅相互联系,而且相互支撑,缺少了任何一个学术板块,郭绍虞的学术体系都将不再完整——本文即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力图对郭绍虞的学术体系做一整体性的勾勒。

郭绍虞先生生平

郭绍虞先生名希汾,字绍虞,1893 生于江苏省苏州市,青少年时代只读过小学和中等工业学校,是一位主要依靠自学成材的学者。

郭先生曾用“象牙塔内,故纸堆中”八个字来概括自己的一生,¹他的一生都没有脱离学术界和教育界:

先是在上海商务印书馆所属之尚公小学任教,不久进入进步书局任编辑,随后进入启秀女中任教并兼职于东亚体育学校(在此期间他编撰了中国第一部体育史《中国体育史》)。1919 年郭先生到北京,在北大旁听,并为《晨报副刊》写稿,随后加入新潮社。²1921 年元旦,郭先生和茅盾、郑振铎、叶圣陶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了文学研究会。同年,郭先生应聘到济南第一师范学校任教,于此时,福州协和大学创办中文系,郭先生遂由胡适、顾颉刚等人保荐登上大学讲坛。由此开始,郭先生先后在开封中州大学、武昌中山大学、北平燕京大学等数所高校任教。在燕大期间,郭先生曾担任系主任和研究院导师,并在此时开始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燕大停办,郭先生不愿入日本接管的伪北大,一度在私立中国大学任教。1942 年,郭先生重返上海,在开明书店任编辑,其间先后在复旦大学、之江大学、光华大学、同济大学任教。解放前夕,郭先生加入地下党领导的大学教授联谊会并兼任同济大学教授联谊会主席。解放后,郭先生出任同济大学文法学院院长,文法学院并入复旦后,郭先生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主任。自 1950 年起,郭先生先后兼任华东军政委员会监察委员、上海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兼书记处书记、上海书法篆刻研究会副主席、上海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所长、上海语文协会副主席等职,并于 195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外,郭先生还曾担任过复旦大学文学研究室主任兼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辞海》编辑委员会副主编、《上海文学》编委等职务。1981 年郭先生成为全国首批博士生

导师之一,到1984年病逝,郭先生在复旦大学共度了35年的时光。⁴

郭绍虞的中国文学史研究

一 新的文学史观的影响与郭绍虞学术的潜目的

从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讲义》到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从1904年起到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以前,中国人已经至少拥有了六七部自己的文学史。专门的文学史著作的出现至少说明了这样两个问题:一、中国人已经开始形成他们新的文学观念,姑且不论这种观念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西方世界的舶来品抑或是他们近百年的学术论争所产生的一个自然结果,或是二者兼而有之;二、这种观念已经开始和中国固有的史学意识相结合,并将在中国新一代学人重新反观他们的历史时为他们提供思想基础。这种文学观念上的变化,在世界的意义上来说是趋合:中国的文学观念被日渐纳入到一种世界性的范式之中,它越来越接近于西方的文学观;在中国自身传统的意义上来说则是趋分:传统文学观中的那些符合西方文学观念的思想被前景化,并逐渐从中国传统的“大文学”观念背景中分离出来,形成了当下的文学概念。文学观念上的这两种不同的分与合的流向对于新的中国文学史的写作影响深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差不多是所有的中国文学史写作者,在写作他们的文学史时,都必须在这两种流向的基础上同时构想出两个不同的言说对象:一个是世界,一个是他们自身的传统。⁵

“五四”以及新文化运动加速了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向近代意义上的蜕化,而对于文学自身来说,它则同时带来了两种最重要的东西:一是关于内容,包括新的民主思想,新的人道主义思想,新的科学主义思想;二是关于形式,新的白话的诗与文。前者来自于那个时代,而后者,它虽然并不是一种全新的事物,但其在此一时期的发展却的确成为一种全新文学理念的体现。

新的文学现象使文学史的写作者和研究者们面临新的难题：他们的文学史不仅要包含对于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古代文学的评论和描述，而且还必须提供一种新的逻辑以对中国新的文学现象进行解释。对于现代的文学史家而言，文学史早已不再是一系列的文学事件在时间顺序上的简单排列和组合，他们深信在文学自身和其发展历史之间一定存在着某种逻辑，正是这种暗含的逻辑导致了文学史的发展指向了当下的结果——能够证明这一点是非常必要的，尤其对于那些笃信进化论的研究者来说更是如此。

郭绍虞最早的两篇关于中国文学演化的论文是《中国文学演化概述》和《中国文学演进之趋势》⁶，这两篇文章后来又被合写成一篇题为《试从文体的演变说明中国文学之演变趋势》的论文。这几篇论文不仅奠定了郭绍虞一生学术思想的起点，而且成为以上所述文学史思想时代特征的一个印证。

《试从文体的演变说明中国文学之演变趋势》一文的一开始就是引用刘师培的话：

刘师培说：“英儒斯宾塞耳有言‘世界愈进化，则文字愈退化。’夫所谓退化者，乃由文趋质，由深趋浅耳。及观之中国文学，则上古之书，印刷未明，竹帛繁重，故力求简质，崇用文言。降及东周，文字渐繁；至于六朝，文与笔分；宋代以下，文词益浅，而儒家语录以兴；元代以来，复盛兴词曲；此皆语言文字合一之渐也。故小说之体，即由是而兴，而《水浒传》、《三国演义》诸书，已开俗语入文之渐。陋儒不察，以此为文字之日下也。然天演之例莫不由简趋繁，何独于文字而不然？故世之讨论古今文字者，以为有浅深文质之殊，岂知此正进化之公理哉？”⁷

并明确指出：

本文所论即本于这些意见，而从文体上说明中国文学之

演变趋势,同时说明无论何种文体都有几种共同的倾向,即是(一)自由化,(二)语体化,(三)散文化,而散文化又是这二化的关键。这样的演化,正是泥古者所慨叹为退化的,实则正如刘师培所说,这是进化的公理。⁸

又引章炳麟的话:

章炳麟也说:“世言希腊文学,韵文完具乃有笔语,史诗功善后有舞诗。韵文先史诗,次乐诗,后舞诗。笔语先历史,哲学,后演说……。征之吾党,秩序亦同。”(《检论》卷五附录《正名杂义》)⁹

《试从文体的演变说明中国文学之演变趋势》的这个“楔子”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说明多种问题:第一,中国文学史在这里是和世界文学相互参照的,它体现了中国文学史观在世界文学史观笼罩下所发生的那种变化,也就是上文所说的“趋合”;第二,中国文学史家比较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一个出发点是中西文学在进化论的坐标上所表现出的相似性,这一点使他们更侧重于从“史”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第三,这段文字也反映了郭绍虞在进入到文学史研究时所经由的途径——在这篇文章中他引用文字最多的二家就是刘师培和章炳麟,而所引之处更多为观点性的文字¹⁰,可见章刘二家的许多观点他是既已接受的——这本身标明了郭绍虞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学术起点。

同时,这篇文章的写作目的也是相当明确的,即以中国文学之演变来印证世界文学发展的普遍规律。所谓“学术本无国界的区别,不妨引以参证以察知中国文学演进之趋势”,只不过因“说中国文学演进之趋势,范围不免太大了”,所以也就只好“只就文体发展这一角度”来谈了。¹¹强调这篇文章所包含的目的性非常重要,因为这里所说的“目的”,对于许多在“五四”以后成长起来的学人来说,它所代表的并不仅仅是一种可能——恰恰相反,它是一种结论,是一种大多数“五四”的信徒都深信不疑的结果。只有把“当下”作为结论和参照,我们才能接

受那种把诗、词、曲、小说、白话文等不同的文体穿成串(而不是将其理解为齐头共进、并行发展)的做法,才能相信文学的最终归宿是“语体”,才能相信历史选择白话文不是一种偶然而是一种宿命——举出一种相反的假设:如果我们的文学史以唐代作为当下,那么,文学的结局就将是诗而不会是白话文!

因此,所谓现代的(“五四”)文学观以及文学,实际上已经构成了郭绍虞学术指向的一个潜目的,当然,这里所说的“目的”要在那种最宽泛的目的论意义上来理解,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在理念中已经存在但在现实中却还需要证明的结果。

“五四”的文言与白话之争促使郭绍虞选择了文体问题来作为他文学史研究的第一个学术突破口,除去《试从文体的演变说明中国文学之演变趋势》一文,《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位置》、《论赋及赋史》、《中国语言与文字之分歧在文学史上的演变现象》、《提倡一些文体分类学》等论文都是从文体的角度来立论的——应该说,以文体的演变来作为文学史研究的第一切入点,这充分体现了一种学术智慧:“文体”之间的区别或联系表现得更加明白和直观,因此比所谓的“内容”更容易被描述,也因此可以更清晰地体现出文学的发展规律——当然,如果确曾存在着这样的规律的话。从上面所列论文的时间跨度上来看,可以说郭绍虞一生都在关注着中国文学的文体问题,其独特的文体观构成了其文学史观中最富有特色的一个部分,从文体的角度来对文学史现象进行解析和描述成为他惯用的学术方法之一。郭绍虞的文体观是自五四时期文言与白话之争那里拓展和延伸而来的,在语言与文学的二元对立系统中来对文体进行考察是其基本的学术特征,围绕着文学、语言、文体,郭绍虞形成了他的文学史整体观。

二 语言、文字、文体与郭绍虞的文学史整体观

身处在一个白话文逐渐占据主流的时代,而主要的学术兴趣又在于古代文学,这几乎使得郭绍虞对于语言问题的关注成为必然。¹²五四时期文言文与白话文在文学形式上的论争在他的学术体系里被转化成

了另一个更深层次上的问题:文学与语言的关系问题。这种转换的意义可以从多方面来理解:它使得白话与文言的表面之争蜕变成了文学与语言深层矛盾互动的表现形式,进而将五四文学论争的历史的社会学的意义消融到了一个共时的语言—文学大系统之内。这种消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能淡化了五四文学论争在社会启蒙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但另一方面,这种转换也促使文学(史)向其自身系统之内回归,文学(史)研究也将因此而有可能从自康梁时代就已经开始急速扩张的功利主义文学观的阴影下走出来,重新获得学理性,而文学,其亦将从其系统内部获得发展的动力。

双声与叠韵:郭绍虞对于汉语音乐性的初步探索

郭绍虞第一篇公开发表的关于语言问题的重要论文是1934年的《中国诗歌中之双声叠韵》。这是一篇具有文学和语言学双重性质的论文,而讨论的问题也介于文学和语言学之间,因此可以看做是其学术研究从文学研究延伸到语言学的一个桥梁。这篇文章“固然只重在述说中国诗歌对于双声叠韵之使用方法,然而同时也重在说明诗歌韵律所以能利用双声叠韵的原因。”¹³文章首先探讨“诗歌与音节之关系”:

诗歌与其他散文之分别,不仅由于韵律的关系,这是尽人知道的。《汤头歌诀》一类的书籍,有韵而且合律,然而不能承认它为诗,正因它缺少诗的重要原素——想象和情绪之故。不过诗歌之为诗歌,除其内在质素——想象和情绪之外,毕竟更重在恰当的安排,毕竟也需要艺术的形式。而在这所谓恰当的安排与艺术的形式之中,同时更不可不利用音乐的语言。易言之,必使语言文字成为音乐化,成为音律的文章,然后能安排得更恰当,而其形式亦更为艺术化。

因此,诗歌之音节问题,也是诗之完美条件的一部分。音节之作用,即在根据心理学上之律动定律,给吾人以一种音乐美的快感。在这种音乐美的快感中间,始能充分地表现他自

己——表现他的想象与情绪。盖诗情之流露,诗的真精神之表现,往往须利用整齐而有规律的语言的;一方面情感愈深刻则音乐的特性愈多,一方面音乐的特性愈多,则所表现的情感也愈以深刻……¹⁴

又论述“文学与语言文字之关系”:

我们须知,这种人为的韵律,果是怎样形成的呢?这固然另有种种的条件,但其较重要者当莫逾于语言文字之特性。无论哪一国的文学,其基础总是建筑在这一国的语言文字的特性上的。由于语言文字之特性不同,所以各国的语法规则也有些出入。其中一小部分固须同于世界语言之公律,但其特殊现象,也不妨定为特种语言之规律。因此各国文学之修辞规律,不得不因其语法规则之不同而有所出入了。至于诗歌之修辞,则以重在声调,重在韵律。所以有时更不惜违反习惯之语法规则以迁就声调。所以我以为这种人为的韵律,其所由形成之主因,是基于其特殊的语言法的,是建筑在语言文字的特性上的。¹⁵

这样,中国的语言文字就获得了它在民族文学中的基础性地位:中国语言文字的特异性为中国诗歌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某种可能,而诗人则成了这种可能性通向美学的中介,他们在韵律学的层面上对这种可能加以利用,并最终将它引向自己的美学理想。在诗人所使用的众多技巧中,最常用而又最核心的是“双声”和“叠韵”:

双声叠韵是单音语孳乳演化最重要而又最方便的法门;古今音之流转,方域音之转变,以及同义字之孳乳转注,相对相反义之引申,无不由于双声叠韵之关系。即其进为复音语词,也多因双声叠韵的关系而成为双声叠韵的连语……何况语言方面,尽管有复音会语,而文字方面总是一字一音,保存

它纯粹的单音字。文字既是单音,则与任何同位同韵之字都可发出双声叠韵的关系,所以诗歌韵律中使用双声叠韵的现象,不必取其义之相同或相近,也不必顾其义之相对或相反,同时也更不必限于双声叠韵的连语。因为这,本与语言之孳乳演化是无关的。¹⁶

“双声”与“叠韵”又可分为两种:语言上之双声叠韵与文字上之双声叠韵。“语言中之双声叠韵往往二音一义,是与意义有关的;文字中之双声叠韵不必全用连语,所以是与意义无关的。与意义有关所以是很自然的联缀;与意义无关所以又成为人为的配合了。”¹⁷

汉语汉字的特异性又造成了双声叠韵可以具有特殊的形式:

又中国语言文字之特性,由于单音与孤立,所以很容易成为对偶的韵律;文有四六,诗有律体,其他如各种应用的楹联,游戏的诗钟,也无不是对偶的体制……于是对偶也成为中国文学修辞上利用语言文字特性之一端。因此,在中国文体上,无论韵文与非韵文,也自有散体与骈体的分别,长短句与律句的分别。

故欲说明中国诗歌中之双声叠韵的问题,更须注意(二)偶的韵律与非偶的韵律。其应用双声叠韵而只以调口舌之和諧者,则往往利用双声叠韵的连语以成为自然的联缀,所以不必定取其对偶。其应用双声叠韵以使其韵律更为复杂化者,则往往利用文字上双声叠韵以见其巧思,所以又必须使成为对偶。¹⁸

双声叠韵现象被分解到两个层次上来理解:语言层和文学层,而联结这二者的枢纽则是现代语言学上所谓的语言的声音层。在语言层上的双声叠韵不过是为了“调口舌之和諧”,而文学层上的双声叠韵则还关涉到中国文字的特性。